



系统中的风格

《小品般若经》
六种汉译本翻译风格研究

刘敬国 ◆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系统中的风格

——《小品般若经》六种汉译本翻译风格研究

刘敬国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小品般若经》的六种现存汉语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在详细分析六种译本的语言特色、译者文化背景、译文产生的时代语境等的基础上,探讨翻译风格的形成机制,认为翻译风格首先是翻译主体(译者)和翻译客体(文本)互动的结果,同时翻译风格的形成又受制于语境因素。目标语文本的风格不可能是源语文本风格的简单复制,也不是译家个人风格的简单体现,它的形成是一个系统的动态过程,有着复杂的文化意义,需要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去考察和分析。

本书可供翻译研究者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系统中的风格:《小品般若经》六种汉译本翻译风格研究/刘敬国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313-07572-7

I. 系... II. 刘... III. 大乘—佛经—梵语—翻译—研究 IV. ①B942.1②H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3112 号

系统中的风格

——《小品般若经》六种汉译本翻译风格研究

刘敬国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韩建民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13.25 字数:170 千字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07572-7/H 定价: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21-57602918



作者简介

刘敬国：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翻译系讲师，文学博士（翻译学方向），先后在《外国语》、《中国翻译》、*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等国内外知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翻译作品五十余万字。研究方向：典籍英译；翻译教学。

前 言

佛经翻译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第一个高潮,历时之久、翻译数量之丰、对译入国文化影响之深,在世界翻译史上都是罕见的。今天,中外文化交流方兴未艾,我们正经历一场新的翻译大潮,译学研究也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包括汉译佛经在内的我国自身的译学遗产进行梳理和研究有着很高的现实意义。

本书以《小品般若经》的六种现存汉语译本作为研究素材,试图从比较全面的角度,凭借第一手资料,重新审视佛经翻译这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借以探寻翻译活动自身具有的规律和文化意义,以对当今的译学建设提供借鉴。

在我国佛经翻译史上,同经异译虽是十分普遍的现象,然而像《小品般若经》这样前后共历九译(三佚六存)、时间跨度达八百余年者,并不多见。而且,这些不同译本的译者多是各个时代的代表性佛经译家,有几位还发表过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译论。从某种程度上说,《小品般若经》的翻译史不啻为整个佛经汉译史的缩影,是我们进行佛经翻译研究难得的研究资料。在研究方法上,本书通过引用大量的哲学史、佛教史、高僧传记、佛经目录、汉译佛经的序言提记等文献中的史实和数据,将理论演绎建立在严密的考证基础上。同时,本书将具体的话语行为还原到它们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之中,将文本的微观特征同其发生的宏观背景结合起来,努力发掘潜藏在历史资料背后的事实、模式和意义。



通过对《小品般若经》六种汉语译本比较,及对不同的译者和文本产生背景的分析,本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翻译风格的形成机制。本书作者认为,翻译风格是译者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运用某一语言在翻译作品中综合表现出来的气氛和格调。翻译风格首先是翻译主体(译者)和翻译客体(文本)互动的结果,是译者以源语文本为依托,在目标语文本中表现出来的在语音、词汇、章法、语法以及修辞等方面的具有个性区分作用的系统性特征。同时,风格的形成又受制于意识形态、诗学、民族心理、时代风尚等语境因素,因而翻译风格涵盖了译者的个体性风格、语体风格、民族风格、时代风格、地域风格和流派风格等。

本书的结论还只是初步的,但这一尝试的意义在于表明:佛经翻译在长达千年的历史中,已经触及或探讨了诸多翻译理论及实践方面的问题,为我们今天的翻译研究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资源。迄今为止,我们对佛经翻译的研究还很不彻底,佛经翻译仍然是一块远未充分开发的园地,仍然值得我们以谨严的学术态度进一步梳理耙抉和重新思考。

本书从选题、构思、写作到脱稿,共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回首这一段岁月,心中满是感恩之情。首先要感谢的是复旦大学外文学院何刚强教授对全书写作无微不至的指导。何教授是我的博士导师,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思想深邃,视野雄阔,使我在攀登学术高峰的路途上受益无穷;他疏阔澹泊、云淡风轻的襟怀也值得我终生学习。还要感谢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魏育青教授、谈峥教授和汪洪章教授百忙之中审阅书稿,并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感谢复旦大学哲学系程群老师、史文博士和古籍研究所王彤伟博士多次解答我在佛学和古文方面存在的疑难。感谢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Monica Esposito 教授对全书写作一直给予的关心和帮助。感谢玉佛寺上海佛学院慧静法师提供查找佛学资料的方便。



本书得以出版,还要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出版社编辑对书稿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校对,指出了不少错误,在此谨对其细致而又辛苦的劳动表示感谢!

刘敬国

2011年8月21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概述	1
二、国内外有关佛经翻译的研究现状	2
三、写作缘起	8
四、写作思路	12
第二章 系统中的风格:翻译风格的形成机制	16
一、概述	16
二、翻译风格的定义	17
三、结语	38
第三章 《小品般若经》翻译风格的流变	44
一、概述	44
二、《小品般若经》的译本	44
三、《小品般若经》的翻译历史	45
四、《小品般若经》翻译风格的流变	52
五、结语	80



第四章 《小品般若经》翻译风格形成中的主客体互动因素	85
一、概述	85
二、客体因素对翻译风格的影响	126
三、结语	128
第五章 《小品般若经》翻译风格形成中的语境因素	134
一、概述	134
二、意识形态因素	135
三、诗学因素	146
四、翻译方式因素	154
五、结语	165
余论	169
附录	175
附录一 《小品般若经》同经异译本品目对照表	175
附录二 汉译佛经流通情况统计表	179
附录三 《小品般若经》译者资料表	181
附录四 佛教词汇释义表	185
参考文献	194

第一章 绪 论

一、概述

佛教诞生于公元前 6 世纪的印度,两汉时传入中国^①。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自然离不开教义的输入,而在教义的输入中,一个核心的环节即为翻译。我国的佛经翻译始于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有了恢弘的发展,经、律、论皆有输入和翻译,唐朝时佛经翻译的规模和数量更是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进入北宋后,佛经翻译开始式微,到元朝,虽也有零星翻译,但已是尾声了。在长达 1 000 余年的佛经翻译史中,到底有多少译人参与,译出了多少佛经,现在已经无法做出精确的统计了。据我国唐代《开元释教录》的记载,截至唐朝开元年间,汉译佛经典籍和中国佛学著作的总数已经有 1 076 部、5 048 卷。以后又有不断增加。清代所刻的《龙藏》收有 1 696 部、7 168 卷。日本编印的《大正藏》则收录至 3 053 部、11 970 卷。我国从 1984 年开始编印出版《中华大藏经》,所收经籍预计将达 4 200 部、23 000 卷。浩如烟海的汉译佛教经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整个人类的文化财富^②。

著名佛教学者欧阳渐曾以“结集—阐发—翻译—刊刻”四个环节概括佛教传播发展的基本过程:“释迦以至道救世,承其后者事乃在于流通。迦叶、阿难,结集流通;龙树、无著,阐发流通;罗什、玄奘,翻译流通。自宋开宝雕版于益州,至予师杨仁山先生刻藏于金陵,为刊刻流通。”(王雷泉,程群,



1998:12)在这四个环节中,应该说,中国的佛教学者对经义的阐发和创宗立说主要都是建立在翻译基础上的。翻译是印度佛学演化为中国佛学的必经桥梁,它造就了巨大的社会需求空间,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对中华民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启超先生曾说:“凡一民族之文化,其容纳性愈富者,其增展力愈强,此定理也。我民族对于外来文化之容纳性,惟佛学输入时代最能发挥。故不惟思想界生莫大之变化,即文学界亦然。”(梁启超,2001a:196)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佛经的翻译就超出了宗教的范围,而具有了广阔的社会文化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研究佛经翻译就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探讨翻译技巧的层次,而是要将翻译作为一种跨语际的文化历史事件进行考察,探寻翻译在文化交流和构建中的规律、作用与意义。

二、国内外有关佛经翻译的研究现状

早在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生就曾撰写过两篇专门论述佛经翻译的文章:《翻译文学与佛典》(1920年)和《佛典之翻译》(初撰于1920年,改定于1922年)。在这两篇文章中,梁氏从译本、译人、译法、译事规模和书籍种类等角度勾勒出东汉至北宋佛经翻译事业的轨迹,并辟专节进行同经异译风格的比较,论述佛经翻译对一般文学的影响。梁氏的这两篇文章可说是现代佛经翻译研究的开山之作,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1929年,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出版,其中第九、第十两章的标题是“佛教的翻译文学”,概述了我国古代佛经翻译的历史,并重点论述佛教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同梁启超的两篇文章一样,胡适的这篇文论也是佛经翻译研究的经典之作。在我国翻译理论界有较大影响的《翻译论集》(罗新璋主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84)全文收录了这三篇文章。王克非的《翻译文化史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第二章“中国古代部分”中,有四节(标题分别是“中国古



代的翻译事业”、“佛经翻译的文体”、“佛经翻译文学对汉语的影响”及“佛经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全部是从上述三篇文章节选而来。现当代讨论佛经翻译的学术文著中,对这三篇文章的引用也十分频繁。

近年来,国内外对佛经翻译的研究方兴未艾,相关文著不断问世。据笔者的整理和分析,这些有关佛经翻译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 有关汉译佛经语言的训释性和理论性研究

这一类研究是指依据古训或利用归纳、联类等方法对佛经汉语译本中出现的个别词汇进行考释,对佛经译本的语言演化进行考察,并分析佛经语言和词汇在汉语史上的影响与价值。相关论文有梁晓虹《佛经词语札记》(《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六度集经〉词语札记》(《古汉语研究》1990年第3期),张联荣《汉魏六朝佛经释词》(《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太田辰夫、江蓝生《〈生经·舅甥经〉词语札记》(《语言研究》1989年第1期),蔡镜浩《魏晋南北朝翻译佛经中的几个俗语词》(《中国语文》1989年第1期),方一新《汉魏六朝翻译佛经释词》(《语言研究》1992年第2期)、《〈大方便佛报恩经〉语汇研究》(《浙江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东汉六朝佛经词语札记》(《语言研究》2000年第2期),吴金华《佛经译文中的汉魏六朝词语拾零》(《语言研究集刊》,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颜洽茂《魏晋南北朝佛经词释》(《杭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郝恩美《汉译佛经中新造字的影响》(《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秋之卷),钱群英《魏晋南北朝佛经词语考释》(《浙江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陈文杰《佛典词语零札》(《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2期)、《〈生经〉词语考释四则》(《语言研究》2002年第2期),何亚南《汉译佛经与后汉词语例释》(《古汉语研究》1998年第1期)、《汉译佛典与传统文献词语通释二则》(《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4期),高列过《东汉佛经疑问句语气助词初探》(《古汉语研究》2004年第4期),孙艳《佛经翻译与汉语四字格的发展》(《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



期),孙尚勇《佛经偈颂的翻译体例及相关问题》(《宗教学研究》2005年第1期)等。专著有李维琦《佛经释词》(长沙:岳麓书社,1993)、《佛经续释词》(长沙:岳麓书社,1999),朱庆之《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俞理明《佛经文献语言》(成都:巴蜀书社,1993),梁晓虹《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颜洽茂《佛教语言阐释——中古佛经词汇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胡敕瑞《〈论衡〉与东汉佛典词语比较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0)等。此外,近年也出现了不少探讨佛经语言或词汇的博士论文,如史光辉《东汉佛经词汇研究》(浙江大学,2001),杜翔《支谦译经动作语义场及其演变研究》(北京大学,2002)等。

严格说来,对汉译佛经语言的训释性和理论性研究更应该归入语言学或汉语史研究的范围之内,但由于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质,涉及文化、语言、哲学、美学、心理学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汉译佛经语言的训释性和理论性研究视为佛经翻译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合理的。

2. 翻译家研究

指以佛经翻译史上的特定译者为核心,对其生平、所译作品、翻译思想、翻译技巧等方面进行阐述的研究。相关文著如西修《罗什研究》(《海潮音》1953年6、7期),柏乐天(P. Pradhan)《伟大的翻译家玄奘》(《翻译通讯》1955年第5、6期),吴正党《姚秦鸠摩罗什尊者略传》(《台湾佛教》1956年第6-8期),隆根法师《唐僧玄奘大师生平之研究》(新加坡:南洋佛学书局,1980),李富华《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译家》(《文史知识》1986年第11期),郑郁卿《鸠摩罗什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88),王克非《鸠摩罗什与严复》(《中国翻译》1988年第4期),光中法师(编)《唐玄奘三藏传史汇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周齐《译经大师鸠摩罗什》(《佛教文化》)1994年第



1 期),本间昭之助《创造“太平洋文明”的基础——鸠摩罗什》(《世界宗教研究》1994 年第 2 期),桑荣《鸠摩罗什研究概述》(《西域研究》1994 年第 4 期),马佩(编)《玄奘研究》(河南出版社,1997),张卫红《试述开元三大印度高僧的译经成就》(《中州学刊》2002 年第 1 期),张松涛《中国千年佛经翻译的总结者——赞宁》(《外交学院学报》2002 年第 2 期),马丽《论鸠摩罗什对佛学及佛教文献学的贡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 年第 5 期)等。

3. 翻译史研究

指以整个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的历史或其中某一特定的阶段为线索,对代表性的翻译家、翻译活动和翻译作品进行描述或评价的研究。相关文著如道安《中国大藏经翻译刻印史》(台北:庐山出版社,1978),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中的“佛经翻译”部分,张曼涛《佛典翻译史论》(台北:大成文化出版社,1978),孔慧怡《重写翻译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2005)中涉及佛经翻译的章节。此外,国内外许多研究中国佛教史的文著中也往往包含对译经史的研究,如荷兰学者许里合(Zurcdher, E.)所著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Leiden: E. J. Brill, 1959),美国学者怀利(Arthur Wright)所著 *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陈观胜(Kenneth K. S. Ch'en) 所著 *Buddhism in China: A Historical Surve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野上俊静等著《中国佛教史概说》(释圣严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72),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北京:中华书局,1979),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 1~3 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988),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2)、《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郭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济南:齐鲁书社,1986)等。



4. 其他

笔者在前面已经说过,翻译研究有明显的学科交叉性质。虽然在世界范围内将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正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同,但对于翻译研究的范畴,理论界目前似乎还没有达成共识。美国学者霍尔姆斯(James S. Holmes)曾将翻译研究分为“应用翻译研究”(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描写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和“理论翻译研究”(theore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这些类别之下又有更小的类别。(Holmes, 2000)以色列学者图里(Gideon Toury)曾将霍尔姆斯的分类方法制成图谱(Toury, 1995: 10)。英国翻译理论家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将翻译研究分为四类,即翻译史、目标语文化中的翻译、翻译与语言学、翻译与诗学(Bassnett, 1991: 7-8)。我国学者刘宓庆将翻译学学科划分为“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两大组成部分,其中“内部系统”包含翻译史、翻译理论和翻译信息工程,“外部系统”则包括哲学思维系统、语言符号系统与社会文化系统,而这些子系统又涵盖哲学、美学、逻辑学、思维科学、语义学、语法学、语用学、文体及修辞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文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学科(刘宓庆, 1999: 17-20)。方梦之先生从编纂《译学辞典》的视角,别出心裁地将翻译研究的发展途径和现有体系比作特大城市的建设体系,并用“一体三环”这一形象的说法概括翻译研究的整体架构。其中的“一体”是指译学本体,包括“翻译理论、翻译技术和翻译史三个方面(其中又以前者为主)”,具体说来,还可分为“基本概念、现代译论、传统译论、原作/中介、译者/译本、翻译方法、翻译技巧、翻译类别、口译、机器翻译/词典、翻译教学/翻译批评、翻译史、国外人物、国内历史人物”等类别,这一中心区域是“自古以来一二千年不断积累、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译学之所以有今天正是有这样一个不可动摇的基础”。紧贴本体的一环是指语言学及其相关学科,包括普通语言学、对比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系



统语言学、计算语言学、描写语言学、篇章语言学、副语言学、理论语言学、模糊语言学、国情语言学、宏观语言学、微观语言学、语法学、词汇学、语用学，等等，这一环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辟和发展起来的，它的意义在于使翻译研究从感性走到理性，从经验走向科学”。一环之外的二环是指同译学本体交叉的其他学科，包括哲学、思维科学、逻辑学、信息科学、心理学、交际学、符号学等，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译学研究不断向横向扩展”而形成的外围学科。处于最外围的三环是文化，其范围非常广大，且是开放性的，“既包括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社会的、文学艺术的‘大文化’，也包括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准则、语言层面的‘小文化’，可以说是无所不包”，而文化的意义在于“把翻译研究跟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意识等全面地联系起来，从而使翻译研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方梦之，2006:1-5）。

以上这些学者列出的研究内容，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能够体现出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但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要做到穷尽翻译研究的覆盖范围则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这是由翻译研究的开放性本质决定的。

为避免使我们的论述看上去过于繁杂琐碎，笔者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将不再对前述三类研究之外的有关佛经翻译的已有学术成果进行细分，而以“其他”拢括所有。这些研究分别从文化学、阐释学、哲学、社会学等角度对佛经翻译的某一侧面进行了理论探讨。相关文著包括曹仕邦《中国佛教译经史论集》（台北：东初出版社，1990），蒋述卓《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1993），王文颜《佛典汉译之研究》（台北：天华出版社，1982）、《佛典重译经研究与考录》（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佛典疑伪经研究与考录》（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黄宝生《佛经翻译文质论》（《文学遗产》1994年第6期），郑延国《合译：佛经翻译的一大特色》（《现代外语》1995年第4期），刘立夫《论格义的本义及其引申》（《宗教学研究》，2000



年第2期),周裕锴《中国佛教阐释学研究:佛经的汉译》(《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吕洁《论佛经翻译理论中的文与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此外,一些题目看似同佛经翻译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学术著作也含有关于佛经翻译的理论探索,如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中的“上编 古代部分(公元148年~1840年)”精选了道安“五失本,三不易”、彦琮“八备”、玄奘“五不翻”及赞宁“六例”等古代经典佛经译论进行了现代语境下的理论阐释。刘宓庆《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将佛经翻译视为中国翻译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索了佛经翻译期的翻译思想及其对后世译学发展的影响。

三、写作缘起

自从20世纪80年代国内有学者提出建立翻译学以来,国内翻译研究领域取得的进展是有目共睹的。不过,如果我们对现状作深入、客观的审视的话,就会发现我们的翻译理论界实际上正处于一种“生态失衡”的局面。具体而言,就是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在我国的翻译研究领域,西方译论占据绝对优势,大量西方翻译理论以各种形式被介绍进来,获得了绝对的强势地位,成为中国翻译研究领域的“主流意识形态”。相比之下,对我国传统译论的梳理、反思与研究却显得十分薄弱。笔者认为,中国译论与西方译论源自不同的文化土壤和思想体系,涉及不同的语言文字,有着不同的发展渊源和发展模式,因而体现出不同的地缘人文和地缘社会特色,两者并不互相排斥,而是互相具有启示意义。引进西方优秀的翻译理论固然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但与此同时,我们绝不应该忽视的是要立足自身文化传统,对我国丰